

古蘭經研究與早期伊斯蘭歷史之連結

蘇怡文*

第一本古蘭經的拉丁文翻譯本出現於西元 1143 年，是由基督教學者 Robert of Ketton 所翻譯，其目的是為了研究並反駁伊斯蘭信仰。西方知識分子持續研究古蘭經直到十九世紀，儘管很多時候是帶著對伊斯蘭的敵意。在十九世紀中期，不同過往以神學辯證為目的，西方學者開始以傳統穆斯林古蘭經研究的框架來探究古蘭經的歷史脈絡與文本架構，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 Theodor Nöldeke 於 1860 年出版的 *Geschichte des Qurans* (《古蘭經的歷史》)，該著作仍影響著今日的古蘭經研究。對於古蘭經的出現與形成，Nöldeke 與其後的學者基本上是採信穆斯林傳統的論述，也就是，經文是在穆罕默德作為先知約二十年裡於不同的時間、地點，針對不同事件下降；穆罕默德雖然有參與經文編匯（經文的排列順序等）的過程，但他過世時並沒有留下一古蘭經定本，而是穆罕默德的追隨者將古蘭經背起來並以口傳的方式教授給他人，同時，也有一些人將部分古蘭經寫下來。直到第三位哈里發烏斯曼 (r. 644-656) 在位時，Zayd b. Thabit 與一些古蘭經背誦者受哈里發任命開始編纂古蘭經始出現古蘭經定本 (the Qur'anic codex)，或所謂的烏斯曼古蘭經定本 ('Uthmanic codex)。

奠基於穆斯林傳統的論述在 1970s 年代開始受到挑戰，也出現對於古蘭經形成的新假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乃是 1977 年，John Wansbrough 的 *Qur'anic Studies*。承襲 Ignaz Goldziher (1889-90) 與 Joseph Schacht (1953) 對聖訓 (hadith，穆罕默德言行的紀錄) 作為歷史文獻的質疑，以聖經研究的類型批判 (form criticism) 出發，Wansbrough 指出，古蘭經不同章節的經文之間或是經文與其他類型的文獻 (*sira*、*tafsir* 等) 之間常常出現內容主題類似但是結構或用字不同的變體 (variants)；是以，Wansbrough 認為建構伊斯蘭早期歷史的材料，不管是古蘭經、先知傳記 (*sira*)、釋經書 (*tafsir*)、聖訓或歷史都是早期教派社群 (sectarian milieu) 用來建構救贖歷史 (salvation history) 的文學產物，古蘭經是從

*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這些材料當中被選出來的 *prophetical logia*，在九世紀左右方才成形，而不是在七世紀中葉由一群人奉哈里發之命編纂出來的「烏斯曼古蘭經定本」。

與 Wansbrough 同樣具爭議性但結論截然不同的論述來自 Günter Lüling。Wansbrough 否定有所謂的「原古蘭經」(ur-text 或 ur-Qur'an)，Lüling 則認為古蘭經之前身其實是居住於麥加的某種基督教社群的聖歌集 (hymnal)，經過穆罕默德與其後的穆斯林社群改編之後成為現有古蘭經。當然，Lüling 並不是第一位探討一神信仰，尤其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對穆罕默德的影響之學者（最早有 Abraham Geiger 於 1832 年出版的 *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hume aufgenommen?*）。但不同於過去注重主題或教義的連結或承襲，Lüling 試圖「重建」他所謂的原古蘭經，他的論述與方法建基於兩點：第一，早期古蘭經手抄本是以不成熟字體 (*scriptio defectiva*) 所書寫，亦即，這些手抄本的經文字體沒有標音與區別不同子音字母的讀音符號 (diacritical marks)，因此原古蘭經的經文意義在阿拉伯字母發展的過程中被扭曲；第二，現有的古蘭經中有反覆出現、類似副歌的經文（如古蘭經五十五章的），根據 Lüling，這些是原古蘭經的聖歌，在穆罕默德與其追隨者的改編後散文化。Lüling 認為三分之一的古蘭經是源自原古蘭經，而三分之二則是來自穆罕默德與其追隨者，現有古蘭經經文中意義不明或展現聖歌或詠唱儀式特色的部分，對 Lüling 來說可能是原古蘭經並且可以被還原重建。Lüling 的論述並沒有引發太多學術討論，直到其後繼者，Christoph Luxenberg（假名¹）造成媒體議論的 *Die syro-aramäische Lesart des Koran* (2000) 之出版。建構在 Lüling 的假設，Luxenberg 強調形塑古蘭經的時空背景其實是以阿拉姆語 (Syro-Aramaic) 為主要的文化知識語言，因此古蘭經的語言其實是某種阿拉姆語跟阿拉伯語的混合語，是以，除卻外來詞之外，古蘭經也保留一些一直以來被誤認為是阿拉伯語但其實是阿拉姆語的句子或詞彙。許多釋經學著作無法清楚詮釋或語法上不符合古典阿拉伯語規則的經文，對 Luxenberg 來說，都可能是由於缺乏阿拉姆語知識的穆斯林，用阿拉伯語錯誤解讀那些以不成熟字體書寫的阿拉姆語經文之結果。如同 Lüling，為了釐清意義曖昧的經文，Luxenberg 用阿拉姆語 (Lüling 則是用各種閃語) 或是改變經文阿拉伯字母的音標或讀音符號來尋找更適切的詮釋。

因為論述與方法上的缺陷，Wansbrough、Lüling 與 Luxenberg 對古蘭經形成的假設並沒有成為古蘭經研究的共識，且近來的考古證據（如 Hoyland, 2008）

¹ 因為擔心會引發爭議，作者是以假名出版。

² 阿拉伯半島的西部，也是麥加與麥地納所在的區域。

與古蘭經早期手抄本研究 (Sinai, 2014; van Putten, 2019) 似乎駁斥阿拉姆語為漢志² (Hijaz) 的文化語言之看法，並支持烏斯曼古蘭經定本之存在。然而，他們的著作卻激發更多的討論，並對伊斯蘭早期歷史的研究上有決定性的影響。古蘭經是在九世紀才成為穆斯林社群的經書的說法並沒有得到支持，但是 Wansbrough 分析關於早期伊斯蘭起源的文獻卻深深影響之後的學者 (如 Crone 與 Cook 出版於 1977 年的 *Hagarism*)，在早期伊斯蘭歷史研究中掀起一陣質疑風潮 (scepticism)，不僅促成更多的觀點與研究方法，也改變伊斯蘭史學者對穆斯林文獻的態度。Lüling 與 Luxenberg 所建構的語言或宗教脈絡不盡然反映烏斯曼古蘭經定本出現前形塑古蘭經的環境，但是其研究也指出，在種種史料的限制下 (不完整且字體不成熟的古蘭經手抄本以及可信度可被質疑的文獻)，深入研究伊斯蘭之前與穆罕默德生活的漢志之必要性。